

The Promotion of Sino-American Educational Exchange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Soviet)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中欧教育交流的

发展

王 森
李兴业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余子侠 主编

中外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中欧教育交流的发展

李兴业 王 森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欧教育交流的发展/李兴业,王森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8-6262-7

I. ①中… II. ①李… ②王… III. ①教育—国际交流—教育史—中国、欧洲 IV. ①G5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059 号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中欧教育交流的发展

李兴业 王 森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21.25 印张
字 数: 34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6262-7
定 价: 3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1978 年以前的中欧教育交流	1
第一节 中欧教育交流的发端与发展	2
一、丝绸之路启开中欧交流之旅	2
二、中学西渐及其对欧洲哲学思想的影响	4
三、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的研究	9
四、西方教会来华传教办学	13
五、西方近代科技与中国洋务教育	19
第二节 近现代中英教育交流	23
一、中西方教育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李约瑟	23
二、早期赴英的中国留学生	33
第三节 近现代中法教育交流	46
一、巴黎大学汉学家与中国名人录	46
二、《红楼梦》法文译本与李治华、雅歌夫妇	55
第四节 近现代中德教育交流	60
一、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留德热潮	60
二、蔡元培对德国大学观的接受与导入	64
三、中德学会与中德教育交流	70
第二章 中国与欧盟的教育交流(1975—2008 年)	74
第一节 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教育交流	75
一、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75
二、中国—欧盟教育交流合作卓有成效	81
第二节 欧盟高教改革与中欧学位互认	89
一、欧盟高等教育制度改革进程	89

二、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互认	93
第三节 中国—欧盟联合培训万名中国“村官”	99
第三章 中英教育交流合作(1978—2008年)	106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下的中英教育交流合作	107
一、中国改革开放与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07
二、中英教育交流合作 30 年	110
第二节 英国诺丁汉大学与宁波诺丁汉大学	123
一、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她的第一位中国校长	124
二、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办与发展	129
第三节 “牛桥”二校的中国情结	136
一、牛津大学的中国学与中国问题研究	136
二、连通中英学人交流的“康桥”	148
第四节 中英全方位教育交流	159
一、中英远程距离教育合作	160
二、中英基础教育合作	163
三、中英青年就业能力与创新精神交流合作	165
第四章 中法教育交流合作(1978—2008年)	169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下的中法教育交流合作	170
一、从建交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70
二、中法教育全面交流合作	176
三、温家宝总理在巴黎理工大学发表演讲	181
第二节 武汉大学与中法教育交流合作	183
一、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交流合作	183
二、28 年合作硕果累累	186
第三节 法国法语联盟在中国迅速发展	192
一、法语联盟第一次进入中国	192
二、法语联盟二进中国及快速发展	193
三、北京法语联盟	198
第四节 法国当代汉语研究与发展	201
一、承前启后的汉学家——戴密微	202
二、继往开来的汉学家——谢和耐	205
三、首获“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汉学家——白乐桑	212
第五节 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创举——中法互办“文化年”	216

一、法国的中国文化年	217
二、中国的法国文化年	223
三、中法文化年的启示	230
第五章 中德教育交流合作(1978—2008年)	233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下的中德教育交流合作	234
一、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德关系发展	234
二、中德教育交流合作 30 年	239
三、德国机构积极开展对华教育交流	252
第二节 同济大学:中德教育交流之窗	261
一、同济与德国的人员交流	261
二、同济—德国合作办学	263
三、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270
第三节 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植入中国及本土化	274
一、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引入	274
二、“双元制”职教模式在中国的试验	276
三、面向 21 世纪的中德职业教育合作	278
第六章 中欧教育交流与中国的现代化	290
第一节 21 世纪的中欧教育交流	291
一、成绩斐然,发展曲折	291
二、面向未来,共同发展	295
第二节 教育国际化与国民现代素质	304
一、教育交流与中国教育国际化	304
二、国民现代素质与中国现代化	312
参考文献	317
后 记	319

前 言

中欧教育交流始终是伴随中欧文化交流发展的,中欧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欧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是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祥地。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大陆,使东西方两大文明得以相互交往。随着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不断扩大和延伸,16世纪下半叶,西方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教义和文化;同时,他们又将东方文化带回到欧洲,促进了欧亚大陆两端人们的相互了解和中欧文化相互交流。17、18世纪,中欧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足以产生“文化热”的地步。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在欧洲引起轰动,当“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①。而欧洲近代科学技术成就也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当利马窦向中国明朝皇帝奉献上自鸣钟和钟表时,皇帝龙颜大悦;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洪若翰等5名传教士,都是些满腹经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清朝顺治年间(1654年),朝廷决定用欧洲人的西历取代回历,也就是从这时起,创立了在钦天监任用欧洲天文学家的惯例,等等。正是“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两股力量持久地推动着中欧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赖以生存的一种载体。”^②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脱离文化的教育,也没有不包含教育的文化。正是由于教育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这种特质,因而本书所论及的中欧教育交流是一种“大教育”的交流,一种“文化教育”的交流。所谓大教育,是一种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的教育,它包括传统教育和非传统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全日制教育和非全日制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城乡人员培训教育等等。所谓文化教育,是指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教育。一个时期以来,当人们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而忽视其教化功能时,“教育的性质受到了挑战,教育在一定的程度上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② 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经常用经济学的术语进行表述,而教育过程的人文和文化方面的特征却被淡化了”,而“我们时代的主要弊端植根于相互隔离(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语言的、社会的和性别的隔离)和经济的不平等”。^①因此,不能孤立和狭隘地看待教育,而应当促成和构建国际理解教育,发挥教育及其交流在人类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中的特殊作用。研究中欧教育交流亦不例外。

中欧教育交流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涉及国家众多,本书取英、法、德三国为例。这种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无论就欧洲范围,还是对于欧盟而言,英、法、德三国作为“三驾马车”,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拥有话语权;教育方面,三国更是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鲜明的代表性。英国是世界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最早将科学教育引进教育领域,打破了人文教育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局面,推动了世界科学教育的发展。法国巴黎大学被誉为“大学之母”,其办学模式成为具有现代意义高等教育的发端,法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在世界上也独树一帜。德国19世纪初创办的柏林洪堡大学,提出将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从而开启了世界现代大学之先河。其次,在近代中欧教育几百年的交往中,较之欧洲其他诸国,中国与英、法、德三国之间交往更多,关系更为密切,受其影响亦较大。中国最早赴海外留学的黄宽(1828—1878)于1850年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的医学博士;洋务运动中,中国派首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事技术的国家就是英国和法国;而且,英、法、德三国一直是欧洲诸国中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至今仍然如此。而在对中国的研究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间的汉学家大多集中在欧洲,尤其是英、法、德三国的汉学家成就最大,在国际汉学界的影响亦最广。加之受篇幅限制、资料有限等原因,本书选择中国与英、法、德三国的教育交流,而未涉及欧洲其他诸国。日后若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够较大范围里论及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交流,以弥补本书这一缺憾。

在中欧以往的交往中,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0多年里,这种交往大多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共和国成立之初,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欧美主要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直到1972年3月,中英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德(西德)两国长期追随美国,亦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总统的努力下,中法两国建交。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2年10月,联邦德国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开始了新

^① 赵中建选编:《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的国家关系。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加之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与英、法、德三国之间除外交层面关系外,其他方面的交流有限,教育交流也仅限于交换少数留学生而已。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得以改善,各方面交流开始正常化。因此,本书第一部分仅作为背景,扼要简述1978年以前的中欧教育交流,而论述重点是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与英、法、德三国以及欧洲联盟的教育交流合作发展。

1978—2008年的30年间,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今天,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①这样,中国与英、法、德三国能够完全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友好交流关系。中国与三国的教育交流,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以及交流质量方面,都是中欧交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中国与三国的交往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矛盾和摩擦,有时还表现得比较尖锐。几十年的事实证明,只要站在战略高度,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利益,通过平等协商,而不是以势压人,就能克服困难,化解矛盾,使中欧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朝前发展。实际上,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共同利益应该大于分歧。中国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面对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和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国际教育交流有责任和义务成为促进各国民众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成为消除分歧和化解矛盾的润滑剂,成为增进各国友好交往和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国际教育交流应该成为国际理解教育,中欧教育交流能够为促进和加强中欧全面交流发挥特殊的作用。

《中欧教育交流》不是一部编年史,它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与英、法、德三国教育交流中的重要事件、代表人物和著名机构等,从多个视角和多个层次展示中欧教育交流合作的发展与成效,并以此体现和折射中欧关系的发展。因此,在论述中采取“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的方式,既有国家和官方的,也有地区和民间的,既有宏观层面和整体的,也有微观层面和局部的,以此审视和反映30年来中国与英、法、德三国的教育交流合作。

中欧教育交流是中欧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为促进和加强中欧全面交流合作尽绵薄之力。

^①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总序

余子侠

教育,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且日益进步;交流,使教育事业得以创新而不断发展。作为人类一种古老而又弥新的文明,中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交流而得以形成、发展、更新和播衍。纵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教育交流,既有将自身现有的最先进文化推向世界的活动,亦有从其他先进的国家或民族摄取自身亟需的文明因子的行为。在这种传输与求取、播衍与认同人类新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通过种种途径一直未曾停歇教育交流活动,并且借助这种活动来逐步推进人类文明的世界大同。



从有人类在中国土地上活动并形成社会以来,尤其自学校教育产生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教育交流在不断地推进和发展。这种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活动,若以中国自身为定点测其流向,则应包括顺向交流、逆向交流和互向交流三大类型。又由于交流过程中各方流量的不同和成分的变化,致使这种以主导方向为标志的类型划分,常常呈现一种冲激互融的交流态势。

所谓顺向交流,是在教育领域以中国为定点,通过相应的渠道或途径,将自身处于先进地位的文明因子和文化成分,传输给其他的国家或民族的交流活动。这种教育交流活动发生时,中国与其交流的国家或民族处于一种传授与收受的不同地位。换句话说,就人类社会最先进文化知识、科技发明以及社会进步的求取与认同来看,在此种教育交流活动过程中,往往其时的中华文明处于一种上势地位或先进势态,中国是文明的传输者和授予者,与其交流的国家或民族是对中华文

化进行一种接收、借鉴、吸纳或认同的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教育交流类型在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表现较为突出,其时通过接收国外学子来华留学,中国书籍在域外的传播翻译,中国士子学人成为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道授业之师,中华文化由是播衍到其他的国家或民族区域,成为他国借鉴的模式和学习的样本。

所谓逆向交流,则是通过种种教育交流的渠道,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接受者,将自己亟需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先进文明因子和文化成分吸纳或引进国内,再结合国情所需融解于自身文明之中。这种教育交流活动发生时,中国与那些拥有先进的文化科技或思想制度的民族与国家相比较,处于一种时代的下势地位,其时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后进势态。对与其交流的国家或民族而言,中国是一个接纳或收受者,其时教育交流的路径或渠道,大多表现为聘请外人来华任教,派遣学子出国留学,借鉴法式出国游历考察,博采新知译介他国著述,甚至一定程度上接受外人在华办学等活动。这种教育交流的目的和功效,乃在于借石攻玉以利取法教育变革发展的精神、内容与范式。这类教育交流活动主要发生在进入近代社会后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段中。

至于互向交流,即中外教育交流过程中,既有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通过相应的教育交流渠道传输到其他国家或民族,又有他国文化或他种文明被引入中国的教育领域之中。其时教育交流的双方,各有对方可资借鉴和吸纳的文明因子和文化养分。当然,这种教育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对等交换,更非以强凌弱地硬性传输,而是立足平等的地位互相取长补短,依据文化互利的原则各取所需。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教育交流类型的出现与形成,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是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时代产物,是走向世界一体化和实现教育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现象。其中教育交流的历史背景是将世界教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视为一个整体,在交流的两极中,中国自然为一极,但另一极并非应然为某一固定的国家或民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教育交流可以吸纳一国或多国的文化养分,也可以将自己先进的文明因子传输给正为自己吸纳养分的对方,但更多的是传输给那些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与中国相比处于后进地位的其他民族或国度。这种类型交流活动在当代尤其本世纪以来的中外教育交流进程中表现尤为明显。

上述三种教育交流类型只是以一种静态的视点相对而言,其实无论哪一个历史时期,中外教育交流的文化内容及活动方式都不是一种类型活动在发展、在进行,而是顺向交流时也有逆向交流成分,逆向交流时也有顺向活动内容,或者互向交流发生时一时顺向成分占优一时逆向成分偏重。这不仅因为人类各大文明互

有长短,文化各有优劣,任何时候交流的双方予对方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相应地交流双方都有借鉴和吸纳对方优长之需,而且由于教育交流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地位都处于一种恒动而非恒定不变的状态,因此在借鉴和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成分或积极的文明因子时,也将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优良部分传输给对方,或者反是,即在传输的过程中对对方的优良部分也有吸纳与借鉴。如若求其区别,只是态度方面的积极与消极,作为方面的主动与被动,流量方面的充沛与弱小,以及交流时选择的层面与领域的不同。即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两个最为明显的“一边倒”历史时期,即隋唐时期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教育交流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外教育交流领域“苏东波”现象的出现,也绝非仅仅只有中华文化向东亚传输或中国全盘借取苏联文化教育这种“要单边”的活动,而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内中国有所取也有所予。

二

在漫长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的教育交流活动不仅持续不断、源远流长,而且其交流渠道和活动形式变换多样。虽说就教育交流的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归划为人的活动和物的流动,即在教育领域中社会主体的交往行为和文字载体的输传来往;若就活动方式和交流渠道或路径而言,自有教育交流活动降及今日,则包括留学生的派遣和接收,教师的引聘和派出,相关文字资料(诸如书籍、报刊)的译介与取用,相关人物的教育访察及学术传输,有关教育团体的参与及其会议举办,有关组织与个人的设学授徒,以及当今时代的影视与网络的输送与接收,如此等等。并非自教育交流活动产生以来就均有所开启和展现,而是随着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就教育交流的主渠道之一翻译而言,这种活动发端甚早。据《礼记·王制》记叙:“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段文字不仅揭明后世所言翻译人士为“象寄之才”的称谓之源,而且表明中国最迟在西周时期已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专职人员以及进行翻译的活动。当然,根据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序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水准,其时的翻译恐怕只是作为语言交流桥梁的口译。这类口译活动,如果作为官方交往的信息传递,必有其语言转译下的文字记载。正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所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而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是扩大语

言在时间和空间上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这两者在促进人类文明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是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间文化交流或文明交融的主要媒介。没有语言文字作为中介,人类的不同国度、不同种类、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就无从谈起。这种语言翻译进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引带出文字翻译。据史籍记载,中国最迟在汉代就有文字翻译活动,其中最为肯定的事例莫过于东汉末期对佛经的翻译。而佛教的传入并由其引发的寺院教育,正是魏晋以下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一种特殊形式教育,其组织方式与教学方法对后世中国的学校教育尤其书院的兴起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历史影响。

与翻译活动一样,教育交流的另一主要渠道留学,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早有发生。在中国古代,留学被称为游学,而这种教育交流活动的最早历史记录可从甲骨文中寻其端倪。据甲骨文的研究成果,《龟》2.25.9有此卜辞:“丙子卜、贞:多子其征学疢,不葺大雨?”其辞义是问一群学子去“疢”地方求学会不会遇上大雨。显然这种求学活动不是在本地进行,而是从甲地远赴乙地去拜师受教的举措。降至春秋战国时期,穿越各诸侯国界的游学活动更是时有发生,无论是孔门之徒七十子,还是“充满天下”的墨家弟子,无论是“从者数百人”的孟轲,还是从游者寡的庄子,各家私学学生中均不乏远道跨“国”游学之人。如果说上述游学活动还只是发生在今日的中国土地上,那么降至两汉,匈奴贵族子弟前来汉王朝中央官学拜师问道,无疑与今日所言的“留学”活动毫无差异。自是而后,外人来华留学活动实繁有徒。而华人出国留学的教育活动,自明清而后更是屡屡有之。

教育交流又一条主渠道是教师的引聘和派出。前者是聘请外国人来华传授教,后者是国人走出国门讲学作师。这类教育交流活动亦源自上古,据史籍传述,周文王姬昌之师就有来自方国的鬻熊,而史籍更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以及“幽厉之后”“畴人子弟”散在“诸夏”“夷狄”的记载,由是春秋战国之际诸家私学蜂起。至汉末三国时期,前有国渊、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教授之声不绝”,后有虞翻“罪放”岭南而“讲学不倦”,这种学随师迁的文化传播方式自然促成教育交流圈的不断扩延。其如儒学文化由辽东而外向推进,于是有了后来的百济国汉学家阿直岐与其“邦之秀”王仁前往日本为师。当然,中华衣冠出国为师者影响最显、声誉最扬的人莫过于明末清初的朱舜水。据王韬《扶桑游记》称,朱氏在日本20余年间收徒讲学实开近代日本“文教之先声”。及至鸦片战争之后外人来华为师,尤其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聘请洋师的活动更是日渐频繁。

比较前述几种渠道而言,跨越国境的教育考察及学术访问,前往他国从事办学授徒活动,以及国际性教育团体及其会议的举办与参与等,则是进入近代社会

以来才有所开辟的教育交流路径。就在中国转而聘请外人来华为师从教之际,伴随社会转型与教育变迁,教育考察参访活动亦在近代中外教育交往过程中开始发生。这条新型而又重要的教育交流渠道自晚清开通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尤其在教育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以不断拓展。身入他国进行办学活动,包括有关组织和个人设学授徒这种渠道,就中国而言亦是近代社会才有的事情,而且与出国从事教育考察参访活动有所不同,近代外人来华办学是在一种国际地位极不对等的情况下的强力所为,当这种活动越过设限而侵犯到国家教育主权之时,教育交流也就变味为教育侵略了。只有在国家主权得到全方位的保障之时,这种教育领域的活动才有了真正的教育交流的含义,如今日孔子学院在各友好国家的出现以及外人投资中国进行合作办学。至于国际性教育团体及其会议的举办与参与,若就中国作为主体投身其中而言,最早的活动可追溯到清末宣统年间。这种教育交流的渠道及其相关活动,真正得到国人的重视是在民国时期,而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利用国际教育组织及其会议这种国际舞台从事教育交流,已经成为一条日益重要的交流途径了。

在现当代的教育交流活动中,开发最晚但其势最盛的渠道,无疑是影视与网络的接收与传输,而且这是一条最科学、最经济、最便利、最广泛的教育交流渠道。严格地讲,这一方面的教育交流无须教育者直接活动其中,但它所给予的教育信息和发生的教育影响可能是一种最大量。其中借助电影进行教育交流,其历史踪迹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借助电视进行教育交流,则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的接收与传输的起始时间就更晚,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当代”事物,它伴随着科技化、信息化时代而到来,又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总体而言,检讨中外教育交流渠道的开拓与发展,可以看出这些渠道的出现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每条渠道的开掘及其相关教育活动的开展,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某种文化需求的时代之必然。

三

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或由哪一种渠道发生的教育交流,其活动对于交流双方而言,基本上都发生这样的演变程序:此类活动的发起或组织,活动过程的具体运作和经过,以及活动发生后对交流国家、民族或地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在这

些影响中,最直接的社会领域自然是教育尤其学校教育本身,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长远景观来看,最深层次的影响应该是文化的变迁和文明的演进。循此认识路向来考察教育交流活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尤其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衍而言,可以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教育交流活动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或时段。教育交流在这四个历史时段各有其主要渠道和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些时期的教育交流对中华文化的演进产生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影响或作用。

在历史学界所认定的先秦时期,其时的教育交流活动主要发生在今日中国版图显示的区域内,其总体特征表现为中华境内各处文明或文化原初发生点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据考古学探掘和研究,今日中国境内的原始文化遗址已达六七千处,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相信这种原始文化遗址不会少于万数。而就今日意义的教育交流而言,这种活动自然发生在文字形成和学校产生之后。即使如此,中国文字(主要指汉字)的成型与学校的产生最迟也在“五帝”末期,而正式以文字记载历史已被确认自夏朝开始。由是可知,教育交流活动在“三代”应是一种非鲜见的社会现象。其时的教育交流活动,从其地域发生来看,若以周王朝建立后分封诸侯为界,则此前为中原王朝与方国之间,此后为周王朝中央及诸侯国之间的“流动”;从其交流渠道来看,应以身怀知识技艺具备“师”之角色功能的人奔走游学为其活动主体。尤其在周王室一次次“失官”之后,这种教育现象更为明显。降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如“儒者西行不到秦”(主要指其前期人物)、“墨突不黔”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表述,无一不显示其时“士”阶层游学(无论是文化知识的传授或是文化知识的求受)活动的频繁,而且在战国中后期,从“学富五车”、“后车数十乘”的历史话语中,人们可以探知其时游学之士是带有“书籍”(典册)这类文字的载体。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稷下学宫,显然是这种教育交流活动的合水处,也是先秦时期中华域内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它的出现及其教育功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华文明有如天文学界所说的星际云不断地凝聚收缩而成恒星,通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先秦时期”的教育交流最终促成华夏文化的成型。

比较第一个历史时段先秦时期教育交流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凝聚成型,自秦而下的第二个历史时段即史界所定的封建社会时期,教育交流主要表现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种种交往活动,其历史作用与影响则是通过教育领域的中外交流而推动东方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先期成型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个较短时期的内在成分的调整,最终在西汉前期形成了儒学主导兼容百家的中华文明,也即从此时起教育交流开始成为中土与外邦之间的“人的活动”与“物的流

动”。自是而降两千年间,中外教育交流的主要渠道和活动形式,一是对外邦来华留学生的接收培养,一是中华书籍在外邦译介传习。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前期,教育交流还承续着历史的惯性而部分地完成着先秦时期的任务,即继续在今日中华版图的区域内实现华夏文化的凝聚,而从整个历史的走向来看,这一历史时期更多的是在向周边民族和国家传输着中华文化,尤其在中后期更是这样,于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造成了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通过教育交流使东方儒学文化圈在中土与四邻之间紧密地联成。这种文化圈的形成过程有如投石入水掀起的波纹,其圈层呈现的图景是由内而外、由小而大——先在华夏各族生活的区域再扩展至域外友邻。

就在中华文化通过教育交流不断地传输四邻之际,在明清时期,以工商经济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借助基督教传教士的来华活动对中国产生一定的渗入性影响,由是东西两大文明开始有了历史性的碰撞。这种渗入与碰撞经过起自鸦片战争的西力东侵的推动,以西学东渐的形式引发中华文化与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发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最全面的冲击与调适。于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生领域的教育交流,中外之间的相关活动出现了换位式的流向变异,而且在这种教育交流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借以活动的渠道也有了新的开掘。近代以来,诸如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外籍教师的聘请与借用,西学书籍的引介与翻译,出国考察的组织与派遣,国际教育组织及其会议的参与与举办,以及相关教育人物来华的教育访问与学术传输,甚至包括外人借助强力的支持来华兴学。如此等等,不仅表明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发生的途径或渠道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更重要的是显示这一历史时段教育交流的主流已在流向上发生了逆转,此际中国已成为一个文化接收者,在一种后进势态的位置上,引进或吸纳西方文明的先进因子用作自我更新的文化养分。尽管这种引进与吸纳有过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阵痛,其程序也经过了抗拒排斥到被动接受再到积极吸收的演进历程。于是在这中外教育交流的第三个历史时段中,对于中华文明的演进或中华文化的发展来说,教育交流所生发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借助对西方文化的吸纳而重整自身体系结构和更新自身机体养分。

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冲突与融收,中华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调适和整合,在自身国力不断增长和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中,其在中外教育交流领域有了新的展现。这种历史性变化可以从20世纪末尤其新世纪到来后中外教育交流显现的种种现象窥见端倪。若就教育交流的渠道来考察,新一轮中外教育交流并没有开拓出更多的新路径,最明显的变化仅在于伴随着科学化、信息化时代

的到来,网络传输在教育交流中越来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但从教育交流的流向以及相应的流量之变化,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正在借助种种教育交流活动走向世界,从而开始形成第四个历史时期——在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趋势中,随着教育日益全球化,中华文化也在日益走向世界,并在东西文明交融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历史推进作用。就教育交流的流向来看,近 20 年来,虽说作为交流的一方,中国仍处于一种逆向交流为主导的国际地位,但顺向交流的成分在日益增长且长速甚快,诸如走出国门办学收徒,中国书籍为他国译介取用,外国来华留学生的快速扩增,对国际教育组织的积极参入及国际教育舞台上话语权的增添,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教育交流已开始转向为一种对外互向交流的时代。这种时代表征还可从量的变化获得取证材料。诸如来华留学生不仅总量上增长甚大,而且在国别上也日益添加;国人出国访学、授教以及参加相关教育组织与会议,在今日中外教育交流领域也已成为一道繁荣而亮丽的风景;中华文化的文字载体(尤其是书籍)也逐渐在各友好国家莘莘学子的案头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而言,从中华文化形成与传衍来看,教育交流可划分为四大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促成了华夏文化的成型,第二时期促进了东方儒学文化圈的形成,第三时期推动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变革和更新,第四时期在于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并推动人类文明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环境。当然,在这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中,教育交流发生的积极作用有所不同。相较而言,古代教育交流其中文化意义大于教育自身的意义,而近代以来的教育交流显示的积极作用更多的表现在教育领域或教育自身,但不论何时何类教育交流,都关乎着中华文化自身的变化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展现。又由于文化及其传衍变异不可称斤斗量,所有这些只是一个“概数”,这些时期或时段只是一种“基本”的判定、“大致”的划分。正如前述,在第二历史时段的初期,教育交流还在发挥促成华夏文化圈成型的功能,同一历史时段的末期,即自明末到清代前期,一方面教育交流还在发挥着形成东方儒学文化圈的作用,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接触着西来文明。与此相应,这种教育交流对中华文化的积极作用,即使在同一时段中也有另类现象的发生,如在第二历史时段中,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引入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加以如此等等说明之处,无非表明笔者的相关论断只是用一种极为宏观的视野来判定教育交流的历史推进作用和文化传播功能。